长征北上遇阻 红军“天降”撕开腊子口

俄界会议后，毛泽东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第1、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的陕甘支队，继续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，向陕甘地区进发。1935年9月16日，到达腊子口附近。

激战腊子口(油画)

国民党重兵把守天险腊子口

“人过腊子口，像过老虎口。”腊子口是藏语的转音，意为“险绝的山道峡谷。”位于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东北的岷山山口，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咽喉要冲，素有天险之称。其间两山对峙如刀劈斧剁一般，沟底只有30余米宽，被水深流急的腊子河占去一大半。

为阻止红军北上，国民党军沿腊子口、康多一线布设了数道防线，尤以腊子口为重点。其中，国民党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在腊子口隘口处，部署了两个营的兵力，沿腊子山梯次配备了一个旅的兵力，在岷州城内还驻扎着四个团，随时准备增援腊子口。

聂荣臻元帅曾回忆说：“腊子口打不开，我军往南不好回，往北又出不去，无论军事上、政治上，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。”

无论如何，付出惨重代价刚刚走出草地、翻过雪山的中央红军，不能再走回头路。突破天险腊子口、打通北上通道就成为红军唯一的选择。

红军多次正面进攻均告失利

领受了攻打腊子口任务的林彪、聂荣臻，马上同军参谋长左权、红2师师长陈光、政委萧华一起到前沿勘察地形。

不过30米宽的腊子口，两面绝壁间有一条长达百米的甬道。湍急的腊子河上架着一座木桥，成了两山间唯一的通道。守敌在隘口木桥的两侧构筑了坚固的碉堡，设置了仓库，囤积着大批的武器、弹药和粮食，准备长期死守。

有长征“开路先锋”美誉之称的红4团，再次挑起重任，担任突破腊子口的任务。

16日黄昏，战斗打响。4连指战员在轻重机枪掩护下，发起猛烈进攻。狡猾的守敌凭借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，等红军接近桥边时，才开始疯狂扫射。敌人的子弹像狂风般刮来，手榴弹像冰雹似的落下。不到一会，腊子口上火光闪耀，硝烟弥漫，狭窄的路上满是厚厚的弹片和没有拉弦的手榴弹。

红军连续组织的几次冲锋均告失利。次日凌晨2时许，红4团指挥员决定改变策略，以政委杨成武指挥2营继续实施正面进攻；同时，由团长王开湘带领1营的两个连从腊子口右侧攀登崖壁，迂回到敌人的背后进行突袭。

但是，两侧陡峭的崖壁，从山脚到山顶有几十米高，连猴子也难爬上去。正在大家发愁时，一个绰号叫“云贵川”、从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毛遂自荐，说他有办法带领突击队登上腊子口。

“天降奇兵”成功破敌

突击队小心翼翼地来到腊子口旁的峭壁前，“云贵川”赤着脚，腰上缠着一条用战士们绑腿接成的长绳，带着一个系着铁钩的长竿子，他用竿头的铁钩搭住石缝里长出的歪脖子树根或者岩缝，像猴子一样一节一节地攀上了险峻高耸的绝壁。

看着“云贵川”身影越来越小，大家都屏住呼吸仰望着，生怕他失手从高崖上摔下来。在大家的盼望中，他终于登上山顶。靠着放下的绳索，突击队员在1连连长毛振华的带领下，拽着绳索，一个一个攀到崖顶，迂回到敌人的后面。

半夜时分，杨成武组织敢死队再次向腊子口敌人阵地发起猛攻。正当进攻受阻时，突然腊子口上空升起一颗白色信号弹，迂回到山顶的红军官兵如神兵天降，居高临下，向敌人没有顶盖的碉堡和阵地投掷手榴弹，敌人死伤大片。正面进攻的敢死队，手持大刀，身背马枪，勇猛地冲向敌人。官兵们上下夹击，打得敌人丢盔弃甲，仓皇而逃。

红4团官兵冲过桥头，乘胜追击残敌。

9月17日，当晨霞洒满大山时，红4团终于占领天险腊子口，并在当天穷追数十里，占领了大草滩一带（即现在的三草滩），缴获粮食数十万斤、盐两千斤。这对刚出草地不久的红军可谓是无价之宝。当地回族、汉族群众对红军热烈欢迎，更使部队受到极大鼓舞。

腊子口一战，标志着红一方面军赢得了长征路上的险关之战，打破了国民党妄图用恶劣的自然条件“饿死”“困死”红军的阴谋。腊子口一打开，全盘棋都走活了，红军踏上继续北上的征途。

据新华社

历史解码

参加长征的人员是如何确定的

1934年5月，在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之后，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战略转移。由于事关重大，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。为了筹划战略转移的相关事宜，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由博古、李德、周恩来组成的“三人团”，政治、军事由博古、李德分别作主，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落实和保障准备。

走留问题属于“核心机密”

长征之前，一般干部的去留，不是由中央组织局决定的。属于省委管的干部，由省委决定报中央；党中央机关、政府、部队、共青团、总工会等单位，由各自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。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。当时，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(张闻天)，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、党团书记是陈云。因此，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，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。而高级干部的去留，则是由“三人团”决定。

党中央、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人员的去留问题属于“核心机密”，留守人员名单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，完全是由“三人团”决定的。在研究留守人员名单时，博古、李德只就军事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，其他方面则只是告诉他一个数字。其实，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都是博古、李德说了算，具有很浓的个人感情色彩，存在明显的宗派倾向。博古、李德尽量将他们认为犯有“右倾”错误、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，留在中央苏区。

主力部队转移之后，红军留守部队将面临着数十万国民党军的“围剿”。况且，留守部队大部分都是伤病员，甚至很多是重伤员，已经基本失去战斗力，一旦苏区陷入敌手，留守人员的前景就可想而知了。

最终的留守名单

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“中央分局”。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。项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书记处书记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，中革军委副主席，具有党、政、军全面工作经验，委任他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、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。项英临危受命，表示坚决服从安排。项英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时任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。陈毅在兴国前线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，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休养。陈毅只好服从中央决定，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、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，与项英一道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。

瞿秋白的名字也出现在留守名单里。对于这个决定，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，毕竟瞿秋白曾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。周恩来找到博古等人，希望能把瞿秋白带上，但博古予以拒绝，认为瞿秋白正患肺病，不宜长途行军。1943年12月，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曾回忆说：“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，我表示同情，曾向博古提出，博古反对。”1935年2月，瞿秋白在突围途中被俘，后被国民党残酷杀害。

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，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、工农检查人民委员、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，后因反对错误的“肃反”而被撤销全部职务。红军主力长征后，时年58岁的他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。1935年2月24日，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，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。

刘伯坚、贺昌、陈潭秋以及所谓“罗明路线”的代表人物毛泽覃、古柏等同志因此也上了留守人员名单。

曾经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也差点没能跟随大部队进行长征。他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曾经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，所以也被列入留守名单。后经周恩来据理力争，刘伯承才随主力红军一道长征。

起初毛泽东也没在长征名单之中

不仅是刘伯承，甚至连毛泽东一开始都没有在长征名单之中。红军转移出发前，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的首长警卫员都去供给处领被装物资，就去领毛泽东的那一份，但负责发放物资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却没有找到毛泽东的名字。曾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在《我的历程》中写道：“当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，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，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。”后来，经过周恩来、朱德、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，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。

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，在中央苏区留下了红24师和地方武装共1.6万余人，以及3万余名伤病员。他们面对国民党军及地主武装的疯狂“围剿”进行了英勇的斗争，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队伍被打散，多数人牺牲、被俘。幸存部队在项英、陈毅等领导下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据新华社